

北伐风云纪光辉

黄定慧

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武汉的妇女运动蓬勃兴起。这次妇女运动突破了以往多年由少数知识分子姐妹孤军与封建势力搏斗的局面，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革命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共同争取解放，使妇女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章蕴（当时名杜韞章）是武汉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我是她的秘书。

虽然已时隔60年，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章蕴同志布置工作总是考虑周密，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使妇女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重视培养妇女干部 北伐军进驻汉口市以后，市党部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妇女部每天都十分紧张忙碌，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首要的工作是什么？章蕴同志抓住了培养妇女干部这一条。她派我到孙夫人宋庆龄主持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去协助做筹备工作，训练班开学后兼任学生指导员，全国各地及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都派妇女干部来学习。此外，章蕴同志自己也常到各类训练班去讲课和演说，她的演说通俗易懂，能用工农大众的语言和妇女受压迫的事实，联系马列主义理论，深入浅出的讲解。我是从她那里才懂得妇女解放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的道理。这在今天已是被实现的真理，是普通的认识，可是在当时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冲破家庭阻拦，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的人还是不多的。

引导妇女参加斗争 1926年10月10日，为庆祝北伐军攻克武昌城，汉口市各群众团体组织了盛大的祝捷庆功大会，街头人山人海，到处是锣鼓声鞭炮声。章大姐领导我们抓住这一宣传群众的大好时机，在新世界剧场举行的庆祝晚会上，自编自演了一个宣传妇女解放的话剧。湖北地方封建势力严重，虐待童养媳和蓄婢纳妾之风盛行，妇女普遍受缠足之苦，男女青年婚姻不自由。我们编的这个戏，表现了一个受恶婆婆虐待的童养媳的痛苦。我扮演了剧中的小媳妇，在台上诉说到缠足之苦，行动不便，动作慢了还要受婆婆打骂时真的泪流满面，台上台下都受到感动，郭沫若、茅盾看了这台戏后，都赞扬戏编得好、演得好。以后章蕴同志常开玩笑叫我“小媳妇”。这次庆祝会开过不久，章蕴同志被调到硚口区委去工作，但仍兼顾妇女协会的领导工作。妇女协会硚口分会发展会员有2000多人，教育妇女识字、放足等都走在全市前列。1927年1月初，武汉三镇暴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收回英租界反帝斗争，工人、学生整日在英国领事馆附近游行示威，女工姐妹们也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控诉外国巡捕调戏女工的罪行。章蕴同志领导我们工作人员给参加斗争的群众送茶水馒头慰劳，直到英国领事馆撤消，英国兵舰开走。妇女群众和大家共同享受到了斗争胜利后的喜悦。

执行政策的模范 章蕴同志爱护干部，从不可苛责，常以自己考虑问题的周密和执行政策的严格，教育和影响干部，使我受益匪浅，举一件小事来说明：有一次，我们处理一件逃妾案，对那家的主妇采取了粗暴惩罚手段。章蕴同志知道后，详细询问案情，知道这家男主人外出，平时妻妾之间相处还不错，而且逃妾当时已有孕在身，便觉得我们处理不当，她亲自登门做工作，对她们二人均以温语开导，使妻妾言归于好。事后有人问章大姐：“我们不是反对蓄婢纳妾吗？”章大姐耐心地解释说，第一，孕妇不能随便抛弃，生硬处理，对母婴不利；第二，反对蓄婢纳妾

主要应在于今后的取缔，对这样既成事实，而且平时相处尚称和睦，遇有小矛盾就予拆散并不是好办法，何况那家主妇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讲清道理能够接受，伤了她的自尊心反易把事情搞僵，调停这类纠纷以和为贵，要以德以理以情以法服人。过不多久，那家男主人回来了，抱着新生的小婴儿来向妇女协会致谢。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那是在1926年冬，我奉章大姐之派，作为妇女界代表参加特别法庭审问被俘军伐部队的官兵。临行前，章大姐再三交待，要我在发言中掌握只办首恶，不究胁从，无辜家属及被株连亲友应无罪取保释放的精神。我按大姐的意见去执行。负责审理工作的董必武、刘伯垂同志都是著名的红色政治家。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二妹的同学葛修銓之兄亦在被宽大释放之列。后来在1942—1944年，我被囚禁于重庆监狱时，一天忽有狱中士兵递给我一包大头菜，内中夹一纸条，声言是当年受宽大处理者，并表示要尽力帮助为我向上疏通，末后署名“葛修銓之兄”。我才又一次深深感到党的政策威力大。章大姐对我的教导，深铭于心。

1927年“七·一五”以后，武汉形势大变，我和宛希俨奉命离武汉赴江西南昌，匆促间未能赴硃口向章蕴同志告别。途中，希俨和我还不时谈起怀念中的章大姐，希俨对章蕴同志极其敬佩。那时，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些同志流露出一修边幅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希俨和章蕴同志一样，是持严肃态度的。可惜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能见到她，但她的革命风范，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任湘潭工委书记时的章大姐

肖 卡

1938年3月初，我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湘南地下党工作。省委组织部长任卓民（当时化名周一民）同志介绍我到湘潭县工委，任县工委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和军事工作，章蕴大姐是县工委书记，还有两位委员，一位是负责联络和交通工作的王南秋，另一位委员是国民党军委后勤部所属一个被服厂的工人叫熊寄萍。抗战以前湖南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湘潭已基本没有地下党组织了。章大姐是1937年12月由省委派去湘潭恢复建立地下党组织的，在不长的时间里，她领导当地和外来的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员，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到1938年3月正式成立了县工委。

当时，章大姐以湘潭长途电话局接线生的职业为掩护。那是一个比较小的电话局，只有1名主任，3个接线生和几个工人。在湘潭，我虽有几家亲属，由于我家里怕我出来革命会被国民党捉去杀头，千方百计阻挡，我是瞒着家里跑出来的，所以不能去依托湘潭的亲属关系，到湘潭后也没有住处和立足点。那时我还未滿19岁，是个青年小伙子，大姐就要我冒充她的侄儿，她做我的姑妈，这样我就可以住在电话局。大姐对大家说我高中毕业，碰上战争无法升学，暂住那里温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白天外出工作或在楼上她房间里假装温习功课；晚上在楼下营业厅里用门板搭铺睡觉。接线生的工作是很忙的，3个人每天从早上到晚上12点轮班，白天还有1人要照管营业，如果有1个因事外出或生

病，其他两个就既要值班接线，又要管营业。大姐就是在这样繁忙的职业工作中抽时间进行党的工作的。为了防止暴露，避免引起怀疑，党员们尽可能不到电话局找她，主要由我去找他们联系。但大姐召开的县工委等秘密会议，只好在电话局她的房间里，因她的值班接线工作，不允许她外出很长时间。有时有些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遇有重要或紧急的事也来电话局找她，她只好挤时间或请人代班来接谈工作。所以从早到晚都很忙，很少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时电话局那个主任还邀请她去打牌，每次还有住在电话局旁的警察局长参加，她不得不去应付一下，不过这也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有时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那位主任是国民党区分部的负责人，经常和警察局长两个人在牌桌上闲扯，大姐也从中了解了一些国民党方面的动态。

湘潭党的工作如何开展？章大姐和县工委坚持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在群众斗争中建党”的工作方针。那时，我们党在湘潭国民党各级政府机构、学校、企业等领导层中都没有党员，也没有找到有影响有号召力的抗战进步人士，原有那些所谓“各界抗敌后援会”等群众团体，都被国民党控制，他们包而不办，不仅不开展抗日活动，反而压制和打击群众抗战的积极性。我们开展的群众性抗日活动，困难很大，只能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去组织工人、青年学生、小学教师、妇女、店员等，以开座谈会、读书会、演讲会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在农村，就通过办农民夜校、识字班来进行抗战宣传和阶级教育。在宣传我党抗战主张的同时，我们也搞一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如被服厂发动了反对打骂欺压工人的斗争，组织了工会。1938年的“五·一”节，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大姐召开县工委会研究，以被服厂支部领导该厂工人为主，动员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店员等，联合青年、妇女举行了集会和游行。大姐还亲自撰写了传单，用群众组织名义散发。尽管她因每天要当班接线，难以外出

活动，但象这样一些重大群众集会活动，她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来参加。在旧社会，一个电话接线生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被人瞧不起。但大姐以她的政治水平和宣传组织才能在妇女界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有很高的威望。她通过参加活动亲自发现和培养了一位小学女教师入党，并帮助她当选为妇女界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后援会召开大会，请大姐去讲话，很受妇女群众的欢迎。在大姐的直接领导下，妇女界后援会的工作也开展得比较活跃。这些群众抗战活动虽然主要是采取分散的方式，规模声势不大，但使原来死气沉沉的湘潭，有了一些抗战的气氛和生机，团结和吸引了不少群众，其中有些人被培养为积极分子或发展入党。本来湘潭只有少数几个党员，到1938年7月，就发展到40多名党员，建立了一个农村区委（两个支部）；城区有被服厂支部、小学教师支部、青年支部，和一些个别联系的党员，湘潭的党组织逐步恢复建立起来了。

为了工作的需要，章大姐象对小妹妹一样地关心爱护教育帮助电话局里另两位接线生和工人们，她（他）们对她都很尊重敬佩，有事愿意找她商量请教。她们看到大姐忙，很愿意替她顶班；她们两个接线生共住一个房间，让大姐一人住一个房间，大姐在房间里接待来访的人或和我们谈工作，她们从不来打搅，彼此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大姐以一个接线生的身份搞群众抗战活动，经常出去开会做报告，同时，各方面来找她的人也渐渐多起来，有工人、青年、教师、军官，穿西装的、穿高跟鞋的、穿长袍马褂的……，引起了电话局那位主任和警察局长的怀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也开始注意大姐的行动，种种迹象表明她已经有些暴露了。1938年5月，省委决定她撤离，由我接替县工委书记工作。

我在大姐领导下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但她对我的指导帮助，对我和其他同志的关心，以及她对工作严肃认真踏实的

作风，使我深得教益，她引导我这个刚从学校出来，不大懂怎样搞党的工作和群众运动的人，投身实际斗争，很快挑起重担。因此，章大姐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壮 心 不 已

邓 洁

章蕴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一位老同志。 60多年前她就怀着共产党在中国必胜的信念，参加革命，历经艰险为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她已到81高龄，还在散发革命的光和热。

早在1938年的夏天，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服务团工作，有幸认识了章蕴同志。那时，服务团才成立几个月，团员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工人。服务团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到前线和农村去宣传，演戏、唱歌、跳舞，慰问部队鼓舞士气，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另一任务是做民运工作，组成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分散住在农民家里，在群众家同吃同住，和群众打成一片，动员群众参加工人抗日协会、农民抗日协会、青年抗日协会。皖南的群众原来看见国民党的军队就害怕，他们的传统观念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新四军刚来的时候，也怕新四军，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新四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当他们见到新四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官兵平等，艰苦奋斗，又受到民运队同志的宣传教育以后，逐渐增强对新四军的认识和感情，积极支援新四军抗日救国。

服务团团长是朱克靖，当时他是非党员，副团长白丁（即徐平羽），章蕴同志任支部书记，是这个新成立单位的党的领导人。她以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模范行动赢得广大团员的爱戴，在团员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她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服务团正副团长本来都有单独的办公室兼卧室，章蕴同志为了联系群众，和女团

员一起睡统铺，早上和大家同时起床出操，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这些优良作风深深印在我的心坎里，至今难忘。那时她只有30多岁，工作上提得起放得开，经常深入到泾县、铜陵、南陵、繁昌等县去视察，指导民运队的工作。每次出去都是带上两三个团员，穿草鞋，自己背背包，徒步行军。回来除了向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汇报外，还向团长朱克靖汇报。她尊重非党的领导人，善于和非党人士相处。汇报内容是那么丰富，不是具有多年的群众工作经验，哪里能作出这样水平的报告。在章蕴同志领导下的民运工作，为新四军在皖南开展抗日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服务团的支部工作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章蕴同志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都在支委会上讨论研究，发扬民主，统一思想。当时的支部委员有副团长白丁、胡明、邓洁和吴敏慎。行政上我任团部秘书，胡明同志和吴敏慎同志都远离团部搞民运工作，只有开会的时候才回来。他们每次回来，章蕴同志总要抓紧时间开支委会交流情况，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章蕴同志喜欢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和她共事使人感到愉快。军服务团的党员不多，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团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过着非常艰苦的供给制生活，许多同志都生疥疮、打摆子（疟疾）。出发去外地演出时，白天行军，晚上演出，还是精神抖擞、乐而忘倦。其原因，一方面是同志们具有自觉革命的觉悟和高昂的抗日热情，更重要的是领导同志对大家的爱护和关心，从各方面给以教育和帮助。服务团还是个革命的熔炉，培养锻炼了不少青年干部，前方部队需要知识青年就来调。然后又不断补充新的人进来。作家邱东平；戏剧界人士李增援、沈亚威；美术家沈柔坚，还有张茜、王于耕、林琳等，都曾服务团的团员。每一回顾过去这一段日子，首先想到的是章蕴同志。大家不仅钦佩她的才干，更仰慕她的品德。有一天和她走在路上，我好奇地问她：“章蕴同志你什么时候参加革命？”

她平静地反问我：“你问这些干什么？”然后她告诉我：她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爱人李耘生同志1932年任南京特委书记，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后壮烈牺牲了。在那黑暗的年代，她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吓倒，踏着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还把两个弟弟杜平和杜剑秋同志引导到革命的队伍中来。那时杜平同志在皖南教导队担任队长，杜剑秋同志在军部参谋处担任科长（后来剑秋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大姐一家真是满门忠烈。

1938年年底，我调出服务团去军医处任政治指导员。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服务团，离开了章蕴同志。我走后不久，章蕴同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妇委工作，大家就很少见面了。在东南分局妇委工作的还有李坚贞同志和邓六金同志，这两位都是长征的女战士。大家叫坚贞同志大姐，叫章蕴同志二姐，叫六金同志三姐。至今许多老同志见到章蕴同志还亲切地叫她“二姐”。

皖南事变后，章蕴同志去苏中二分区担任地委书记，我到盐阜区抗大五分校工作。我曾给她去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到了苏北，尽管那时她的工作担子重，还是很快给了我回信。信中大意是：“皖南事变时听说你已牺牲！现在证明是谣传！不久前听说你到苏北，经常想起你，但我这个人勤于心念懒于执笔。经过皖南事变同志们之间的革命感情更加深厚。……”战争年代在敌后通一次信很不容易，以后再没同她通信。

全国解放后，章蕴同志任华东局妇委书记、华东区妇联主任兼上海市妇联主任。我任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1951年夏，苏南区党委要我担任苏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我自知我不善于做妇女工作，迟迟未去报到。大约在九十月间，章蕴同志来到无锡参加苏南妇女工作会议。她要区党委组织部长陈一诚同志通知我去见她。我见她神采奕奕，感到由衷的高兴。她找我是动员我去做妇女工作。她耐心地对我说：“全国解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

第一步，今后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发挥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力量。现在很需要有经验的女同志来担任妇女工作的领导。”在她反复说服下，我思想通了，愉快地到妇联去上任。当时，在华东，章蕴同志是位能领导全面工作的女同志，但她不论做全面领导工作还是做妇女工作都很关心妇女的疾苦，视妇女解放事业为己任。她在无锡那几天，苏南区各县的妇联主任都来无锡开会，这些同志当时都很年轻富有朝气。她看了高兴地对我说：“你看她们那个精明强干的样子，多么令人喜爱！”她认真地听取来自下面的工作汇报，组织大家讨论。在离开无锡前夕开的一次有区党委直属机关女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她号召大家行动起来进一步开展妇女工作。那次和大姐一起活动，对我来说是学习怎么做妇女工作，也是皖南军服务团之后又一次向她学习的好机会。从那以后一直到1952年底成立中共江苏省委，我都在她的领导下工作。

十年内乱中，绝大多数老同志都成了专政对象，我也不例外。在那苦难的日子里，我常在夜深人静的失眠之夜怀念起许多老同志，章蕴同志是我深切怀念的一位。那些日子不准我们通信，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被说成“黑串连”，公民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陆续有外调人员来向我调查30年代新四军服务团同志们的历史。有的同志的情况我已忘却，便建议去找章蕴同志。我希望通过那些“满天飞”的革命造反派知道点章蕴同志的消息。这些人善于封锁消息，他们往往对我轻描淡写地说：“找过了”。“章蕴叫我们来找你，她说服务团党的工作后来多由你负责。”仅仅这一点消息，也能使我猜测章蕴同志健在，脑子清楚，我暗暗感到高兴。

1978年，组织上把我们夫妇调到中央党校工作。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章蕴同志。章蕴同志和我紧紧挨着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她说话声音很低很慢，看得出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创伤还

没有完全恢复。问起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折磨，她说康生和李耘生同志是同乡，康生怕章蕴同志知道他那见不得人的历史，为了灭口就诬陷章蕴同志是叛徒，强迫她干力不能及的劳动，无休止地批斗。也有个别风派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心迹落井下石，这种人虽不多，灵魂深处暗藏的隐私也使人厌恶。章蕴同志胸襟开阔不去计较，只是淡淡地说那种人做小动作、打小报告目的无非是讨好造反派。我劝她注意休息，抓紧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她不同意我的意见。她说：共产党员象春蚕，丝未吐尽，哪能休息！这是她经历劫后的誓言，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境界。看着她，不觉想起陈毅同志写的诗：“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精神。”

章蕴同志是言行一致的，她怎么说就怎么做。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果然不顾年老体弱，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我见到的也有几次。

1982年初，她来中央党校作《增强党性争取党风根本好转》的报告，报告之前我去休息室看她，也许她正考虑报告内容，我叫她没有得到反应。我以为她精神不好，有点担心，默默地跟她走到窗前，她才认出我，轻轻叫了我一声：“邓洁同志！”我对她说起我的担心，怕她不能在这么大的礼堂讲那么长时间的话。她表示坚决要讲。一站上讲台，她的精辟的发言就吸引住了大家。会场的秩序很好，许多同志都拿出本子记录。讲了两个小时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劝她休息，明天继续讲，她执意要在下午讲完。当她宣布下午继续讲的时候，会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是赞扬她讲得好，也表扬她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我也激动得拍红了巴掌。

去年深秋时节，她来到南京，我去看她，她已满头白发，听觉也衰退了，但脑子很清楚，对人一如既往的热情亲切。谈话间，会客室里陆续来了好几位参加座谈会的老同志。章蕴同志宣布开会时说：“这次来南京，一是为纪念烈士耘生同志的80诞

辰；二是想听听同志们关于怎样建设好执政党的意见。执政党不同于地下党，也不同于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党，如何建设好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问题。”大家发表意见时，尽管有陪同她来的同志做记录，她还是自己仔细地听，认真记，有时听不清就请发言的同志重讲一遍。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怕她累了都不肯再讲，她还一再说：“还早呀，再谈谈不好吗？”那次到南京，她虽住在风景优美的东郊，却既没欣赏优美的秋色，也顾不得好好休息，除了开会就是接见去看望她的老同志，她这种到了晚年仍然壮心不已和地位高了不忘旧交的精神、品德，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章蕴同志在苏中

关建 段扬

40多年前，我们曾在章蕴同志领导下工作，她那正直无私、坚毅果断，以身作则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虽时光已流逝了近半个世纪，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

智勇双全的女书记

抗日战争期间，章蕴同志是苏中抗日根据地唯一担负地委一级党政全面领导工作的女干部。1939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逐渐暴露后，她根据党的决定，于11月从皖南长途跋涉来到江苏敌后，先后参与了苏南、苏中区党委领导，任区党委委员。1941年春，她代表苏中区党委和行署，率队到黄桥地区发动群众完成征粮任务，不久又来到泰兴县委帮助开辟工作，还曾去靖江县委代理过县委书记。在苏中二地委成立之前，她代表区党委领导过东台中心县委工作。这年冬天，成立了苏中二地委，章蕴同志任二地委书记。后来由于执行敌后党、政、军、民一元化的方针，即由新四军二旅政委陈时夫同志兼任书记，陈时夫同志主要抓部队工作，二地委的地方工作包括党政群和地方武装等，均由章蕴同志全面负责。

苏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地区，它是通联活跃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新四军和北方八路军的枢纽地带。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京沪杭一带的敌伪军，更是在京沪杭附近打击敌伪的我军的坚强后盾。但它自身却处在敌伪顽

的夹击中。章蕴同志领导的二地委所管辖地区——东台、泰东、兴化等沿运河以东一带，是敌伪顽三角斗争相持最长的地区。在那敌伪据点林立、梳篦式反复扫荡、清剿、清乡的恶劣环境下，在交通阻断、资源拮据的条件下，章蕴同志领导群众坚持抗日斗争、进行敌后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其任务确实是既光荣又艰苦的。在领导二地委的各项工作中，章蕴同志充分显露出她有独当一面、领导全面工作的组织才能和工作魄力。她性格开朗，刚柔兼容，既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英武气概，又能团结同志共同奋斗。不论党群工作、民主建政、发展生产、组织民兵、领导地方武装斗争以及动员参军扩大主力部队等工作，她都亲自上阵。二分区前后几任军政领导人，对她的英勇机智、有胆有识以及踏实细致又大胆泼辣的工作作风，都表示过钦佩和赞扬。广大干部和群众也都反映：在章蕴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信心有办法。二地委所辖的几个地区，在章蕴同志的领导下，在艰苦斗争的年月里，多次取得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的胜利，从而发展了抗日力量，壮大了敌后民主根据地。

执行群众路线的模范

在党中央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了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对于党的群众路线，章蕴同志一贯领会运用得比较成熟，她深知把群众组织起来才是支援和掩护部队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才能坚持武装斗争。她在苏南第三游击区指导中心县委工作时，领导上交给她的任务只有一句话、三个字：人、枪、款。她认为人是第一位的，就说服县委首先做好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她帮助县委在各县普遍搭起农民抗日协会架子，通过农抗会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坚持抗日的宣传，并在各项斗争中注意培养、筛选干部。章蕴同志善于在具体工作中帮助干部锻炼成长。有一次她听说九华山大庙的和

尚强调“出家人不管事”，影响了当地工作开展时，就开导干部们说：“你们去告诉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尚出了家没有出国。”正在畏难中的干部听了章蕴同志的指点，茅塞顿开，理直气壮地反复进行抗日爱国、人人有责的宣传，争取了群众，效果很好。由于章蕴同志在组织宣传群众方面的特殊才能，中心县委在她的领导帮助下，在防止粮食外流，加强地方防御等工作中都取得了成绩，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坚持抗日的积极分子和干部。

章蕴同志在二地委负责全面工作时，坚持执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她虽身居地委最高领导岗位，但从不单靠坐机关、发指示，而是经常自带行装深入到群众中去，和广大干部和群众共同战斗在第一线。她以自己对党的政策的深透理解，深入浅出，生动地向群众作宣传发动；或亲自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或到基层机关慰问干部，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工作。她崇尚实事求是，遇事都经过调查研究，从不盲目主观行事。二地委领导开展的各项群众运动和中心任务如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等，她总是亲自试点或事先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全面推开或发指示。当时兴化县委组织部长陈大同以及泰东县委领导同志都经常从章蕴同志那里得到具体的指示和帮助。章蕴同志平易近人，同志们有疑难都愿找她谈，大家对她信得过，因为，她从来对大家的问题都是就地当面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也直接了当地讲清楚，从不含糊。

二地委的广大干部在章蕴同志的身教言传下，也都注意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重视调查研究。由于群众基础扎实，当时二地委总是较好地完成任务，这与章大姐的领导有方是分不开的。

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的组织者

1941年后，敌伪不断对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武装骚扰，章蕴同志除在地方工作中积极发动参军，扩大主力外，还大

力组织地方武装与敌伪进行武装游击战。她一面指导各县迅速建立各种短小精悍的民兵队伍，一面奔赴敌人枪炮声频繁传来的二分区中心区，亲自在那里发动群众，指导中心区壮大民兵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并帮助他们运用以少胜多的策略，迫使敌伪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当时地方武装武器装备很少，章蕴同志就发动大家千方百计搞枪枝弹药。据张逸城同志回忆，有一次在她工作的地区，有群众反映顽军撤走时，曾埋藏下一批枪枝，但派人去挖未挖到，大家正在懊恼时，章大姐知道了，就帮助大家分析情况，要大家进一步去做好窝主的思想工作，在晓以大义、说明厉害的情况下，窝主说出了藏地，使地方获得了一批枪枝。为了粉碎敌人的侵袭，章蕴同志在一次行军中，不幸从马上摔了下来，伤了筋骨，但她仍忍着剧痛，不露声色地和往常一样率领武装去打击敌人，以后也未因此而稍怠战斗。章蕴同志的两条腿，在无数次的战斗行军中经历了几多风雨，湿了干，干了湿，以致造成严重的腿膝关节肿痛，直到现在仍缠绵不断。

由于章蕴同志指挥战斗时英勇机智，屡获战果，当地群众都称赞说：此地有个女旅长，鬼子、“二黄”听了就胆丧。

爱护关心同志的好大姐

章蕴同志爱护干部、关心群众疾苦是一贯的，也是感人的。1941年，泰东县委的于晶等10多位同志被李堡、拼茶的伪军所劫俘。章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就象亲兄弟姐妹有了急难一样，立即写信，派人专程送给联合抗日司令部司令员黄逸峰同志，请他火速营救。这些同志回到根据地后，章蕴同志又热情接待，嘘寒问暖，体贴入微，使大家深深感到党的关怀和温暖胜如父母，激动得热泪直淌。这批人很快被分配了工作，愉快地重新走上战斗岗位。有一次章蕴同志了解到在泰东县政府做教育工作的杭苇同志，工作积极能干，但他爱人陈怀白却远在如皋县工作，她就设